

体育精神引领青年奏响时代最强音

□ 丁 宁

深深根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流入中国精神之河，并成为中国精神的一部分。体育运动正在为健康中国铸就基石，体育精神正在为新时代增添无限活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许多中华体育人，他们获得的每枚金牌背后，都有许多感人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在他们身上彰显了中华儿女的优秀品格和体育人的精神风貌，其美德感染和激励着更多人见贤思齐。乒乓精神是中国人自信、自强的精神象征，身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自觉拥抱体育，使其铸就昂扬向上、建功有我的奋斗精神。

赛场是共同竞争的一个舞台，有许多运动员，他们从最初的无缘奖牌，到如今的尽数包揽，中国体育在世界上已迅速崛起。这一切的背后，不仅仅是运动员们的辛苦训练和坚守为国争光的梦想，更是在党、国家和人民的关心支持下，永葆求新求变的勇气，用专业素养提升实力，以开放包容博采众长，靠苦干巧干赢得竞争。这是体育人长征路上不畏艰险、奋力追上时代的底气所在。

能够在世界赛场获得金牌，为国家争得荣誉，我感到无比自豪。我深知，在祖国荣誉面前，每一位国乒人都心甘情愿为国家 and 集体贡献全部力量。一代代中国乒乓球队不懈奋斗、顽强拼搏所树立起的乒乓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乒乓球队健儿们的斗志。

（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青年寄予殷切厚望，进一步激发起青年一代追梦、逐梦，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

（一）

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叶红船满载人民的重托和民族的希望，扬帆起航，劈波斩浪，成为领航中华民族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镌刻无数青年许党报国的奋斗身影，汇集着无数青年的热血和奉献。

体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体育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努力拼搏，不抛弃、不放弃，不仅让肌体更加有力，更让灵魂越发坚毅。体育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在艰难时刻还是平凡时光，体育一直都能够强身健体、凝心聚气、振奋精神。在激烈竞争中，中国体育健儿敢于比拼、勇于争锋、永不言败，面对困境不言弃，面对挫折不气馁，在竞技场上使尽洪荒之力，尽展中国风采，书写了辉煌壮丽的爱国主义篇章。

用青春之我奉献青春之中国、伟大之民族，是百年来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何其有幸，见证百年；何其有幸，生逢盛世。作为当代青年体育人，深深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感受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我们的前辈给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我们要勇敢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心怀国家和人民，砥砺前行“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的勇敢担当，激励“舍我其谁”的奋进豪情，汲取伟大建党精神的“精气、神”，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以青春之我贡献青春力量。

（二）

中国体育人在实践中，得出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体育精神，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精神财富。祖国至上、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情怀，是中国体育人的光荣传统。其



□ 朱 清

书院文化复兴贵在转化创新



书院发端于唐、成型于宋，主要讲授儒家学说，是古代中国教育发展的产物，也是华夏先贤的伟大创造。

早期书院多属民办，体现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南宋朱熹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开创书院制度化与书院理学一体化格局。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历久弥新，离不开书院对儒家道统的持守。历史发展中，书院兴衰流变，但其藏书、讲学、著述、奉祀先儒等教化功能一以贯之；其传承、创新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了千余年中国的命运。宋元明清，书院和理学一道担起“治国平天下”使命，对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和维系中国“大一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书院规制被东亚及世界各地吸纳，成为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与朱子理学相关的书院遗址”作为武夷山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一）

宋代思想家、教育家朱熹，世尊“朱子”，是理学集大成者，也是书院文化集大成者，其诞生至终老，包括童蒙、治学、仕进、授业、著述等大部分时光都在福建度过。闽地誉称“理学名邦”“闽学摇篮”，皆同朱熹和书院密切相关。

朱熹一生创办、修复和读书讲学的书院多达60多所。南宋之初，朱熹为救亡图存，在闽北先后创办寒泉、云谷、武夷、考亭等几所书院，留下他和弟子们构建理学付出艰辛的历史印记和文化丰碑。其中，“武夷精舍”（今武夷山“朱熹园”）和“沧州精舍”特具历史意义，朱熹在此修撰《四书章句集注》，完成理学体系构建，培养理学菁英“数百千人”，形成彪炳理学的闽学。“沧州精舍”建于绍熙三年（1192年），位处闽北建阳（今南平市建阳区）的考亭，淳祐四年（1244年）宋廷赐其名“考亭书院”。

考亭书院是朱熹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也是其晚年定居之所。这期间，朱熹被朝中佞臣诬蔑为“伪学魁首”，遭受迫害，但他在逆境中坚持讲学著述，捍卫儒道和构建理学矢志不渝；他在弥留之际，仍抱病修订《大学·诚意章》和《楚辞集注》，发出护国济民的绝唱。辛弃疾祭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后人将闽学称“考亭学派”，也是对朱熹人格和书院道场的礼敬。

考亭书院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在于其自身价值，是朱子理学集大成和考亭学派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是理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另一方面在于其社会感召力，是南宋时期中国理学的研究中心，由此带动理学和书院在各地的兴盛及至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空前发展。

朱熹自办的书院，其设施都很简陋，但学界认为：“以当时的规模而言，考亭书院远不能与（北宋）四大书院相比，但若以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影响而论，考亭书院足以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座书院相提并论。”还有如下看点：一是朱熹为政清廉，少有积蓄，但凡自办书院都“自掏腰包”；他率弟子勤工俭学、搭梁叠瓦，茅屋草寮即为书院。显见其公私分明、俭以养德；二是朱熹自办的书院都自称“精舍”或“草堂”，冠名“书院”都是他去世后朝廷或官府所赐，后世的历代扩建，是对其思想的褒扬；三是朱熹每逢为官主政一方，都对修复书院、办好书院倍加用力。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在他的主持下得以修复扩建，匡正学风，熠熠生辉。可以说，朱熹是保护和发展书院的楷模。

所以说，评价一所书院的价值，不仅要看其建筑年份多久、规模多大，更要看其对民族精神的滋养有多丰厚、铸造文明的功绩有几何。

（二）

儒学和理学皆为治国之道，书院也必然是教育与政治的交汇。西汉尊儒术、东汉发明造纸和印刷术后，官府私家的藏书大都青睐儒学典籍。故书院在宋以前主讲“五经”，理学兴起后则以

授学《四书章句集注》为主，围绕“仁义礼智信”和“存理灭欲”等思想，完善儒家伦常，规范人们行为，以化解社会矛盾，使国家安宁、天下太平。

南北宋之交，书院尤为重视德育，对督促统治者整饬吏治、节制贪腐和引导社会拯救国家、提振民心等，都产生巨大作用。朱熹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旨在纠正南宋学府中谋官逐利、不务实学、追求享乐的不良风气，明示教育的目的不是只为科举取士，最重要的是端正伦理道德，先教“五伦”，掌握做人规矩；再教“为学修身”“处事接物”，培养学生博学笃行，做讲仁爱、重民本、崇礼义、知廉耻和俭约自守、心怀家国、知行统一的经世之才。朱熹为岳麓书院题写书院训学“忠孝廉节”，对经世之才的意涵做了精辟诠释，昭示了“有教无类”归根结底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

自南宋起，《白鹿洞书院揭示》被立为办学指南，岳麓训学成为中国各类学府的立训先声，讲的都是儒家道德修养的目标。“立德为先”的书院教育，锻造了层出不穷的治国栋梁。仅明清时期，与福建书院教育相关的代表性杰出人物就有俞大猷、郑成功、林则徐、梁章钜、左宗棠等民族英雄和顾宪成、黄道周、张伯行、蔡世远、沈葆楨、陈宝琛、林纾等仁人志士，他们护国济民，功昭千秋。

（三）

斗转星移，社会巨变，当下的书院发展也必然出现新情况。形态上，有修旧和重建的，也有属于新建的；内涵上，有的讲习典籍，有的鉴赏文物或演绎古装，也有文艺沙龙或开展书画娱乐礼仪等培训，“书院”牌匾随处可见。书院是华夏先民的精神家园，当代人正唤醒其美好的历史记忆。但面对“书院热”，也必须提出“书院复兴何处去”的现实命题。就是说，当代书院究竟要怎么办？其与书院传统应有怎样的关联？这需要党政部门因势利导，使之行于正道。

书院属传统文化，其复兴的目的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立德为先”“忠孝廉节”的思想，赋予其时代特

征，应当是书院复兴的取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书院复兴，把握方向，率先垂范。他多次考察书院，并引用朱熹知漳州时题写的书院门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告诫党员干部要心胸开阔，志存高远，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书院复兴，应当以思想道德教育为灵魂，“继承传统”与“转化创新”融通并进。“继承传统”，就要专下心来，循序渐进地研习一些反映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学和理学的代表性著述，选读一些其他百家学说的优秀典籍，通晓书院的发展史及其精华之所在。进而，从三个方面推动“转化创新”：一是研习传统文化著述典籍同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领悟其间的一脉相承和时代内涵。二是古典教学同普及现代中外文明、科技知识相结合，扩展胸襟，海纳百川，激发改革开放和创新的热情。三是传授护国济民思想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相结合，落实在凸显“人民至上”和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统一的行动之中。

还必须指出的是，“继承传统”和“转化创新”，都应当细化项目和可操作，使书院复兴具体化。

（作者系原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白云岩紫阳书院朱熹联句石柱

切实使“双减”政策落地见效

□ 舒 刚

会教育工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而不是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与教育规律背道而驰。

要认识到，国家实施“双减”政策，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既回应了人民对教育民生领域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也是针对一些长期困扰广大家长、教师和学生普遍关注的教育焦虑问题。要解决这些教育焦虑，根本上在于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持实施素质教育。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意见》的出台体现出党中央从“两个大计”的战略高度，营造良好社会育人氛围、构建良好教育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坚强决心。

促进我国教育过程公平。保障基本教育公共服务的公共性、普惠性、基础性、发展性，是国家的基本公共职能，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现实需求。教育的这一重要属性决定了，校外培训机构要参与教育事业，就必须深刻领会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坚持将公益性放在第一位，提供的校外教育服务项目和产品都要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助于推进社会公平，有助于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享有适合的教育，帮助他们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教育政策在实现教育公平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要承担起促进教育公平的重大责任。一般而言，一个致力于教育公平的政策设计应主要关注资源配置均衡和机会平等。教育公平不仅包括在看得见的层面的教育资源

与教育机会的公平配置，更包括在看不见的层面进行补偿。

《意见》的印发实施是针对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所作的重要决策部署，更是对学校发挥教书育人主体作用、校外培训机构回归育人正常轨道的一次纠偏。文件中明确的“五个严禁”：严禁培训机构资本化运作，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既是对从严治教、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划出的底线，更是促进教育资源实现更优质的均衡配置、实现教育过程公平的创新之举。

遵循法治思维依法治理。当前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要解决好困扰教育发展的顽瘴痼疾，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点，进行综合治理。无论是教育发展还是人的成长，都需要科学的规范，更需要合理的引导。

落实好“双减”工作和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必须深刻吃透《意见》精神，做到标本兼治、疏堵结合，既要依法依规，科学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教学行为；又要客观理解家长的教育需求和对孩子的成长期待，从观念到行为上进行合理纠偏和正确疏导。《意见》出台后，各省市相继出台当地的相关政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行动在各地陆续开展，治理成效必将逐渐显现。“双减”工作目标既体现在校内方面，让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

理，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同样也体现在校外方面，推进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全面规范，学科类校外培训各种乱象基本消除，校外培训热度逐步降温，两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倒逼通校改革教学方式，着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优化课后服务设计和服务质量，有效减轻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

怎样引导校外培训机构通过观念升级、业务转型，提供符合素质教育方向的、有效补充学校教育不足的服务产品，应该是“双减”工作的题中之义。根据相关部门公布的相关配套政策来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其治理体系和措施逐渐成熟。各方治理主体要坚持依法治理、协同治理、疏堵结合、综合施策的原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从严审批培训机构，强化培训内容监管，创新收费管理方式，规范培训行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培训行为，切实维护广大家长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切实形成“双减”综合治理长效机制。

